

中国神秘文化系列

《周易》与人生谋略

刘孝存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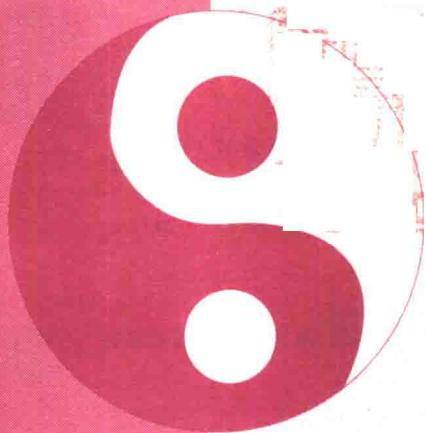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神秘文化系列

刘孝存著

《周易》与人生谋略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易与人生谋略/刘孝存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
1998.12

(中国神秘文化系列)

ISBN 7-5059-3242-X

I. 周… II. 刘… III. 周易-人生观-研究 IV. B22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7382 号

书 名	周易与人生谋略——中国神秘文化系列
作 者	刘孝存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任 杰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41 千字
印 张	11.37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6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242-X I·2453
定 价	18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引言：“易”的演变与《周易》本义

对于“易”，历来有多种解释。

一种说法为：易是飞鸟的形象。鸟的象形字为𪇑；易的小篆为易，似乎也是鸟的象形。因此“易”与飞鸟同。取其义，飞鸟瞬息万变，易也如飞鸟一般，千变万化。也就是说，“易”是研究事物千变万化的学问。

另一种说法为：易是蜥蜴，其身体表面有细小的鳞片，通称“四脚蛇”。蜥蜴，也作“蜥易”。“易”的金文作“𪇑”。据说蜥蜴的保护色，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。取蜥蜴保护色的变化为“易”，来象征宇宙万物的千变万化。

还有一种说法为：易由日、月而成。日的象形字为☉；月的象形字为☾；变形为“𪇑”。由于日代表阳，月代表阴，易合阴阳，象征阴阳二元论哲学。

孰是孰非？且不要急于下结论。

我们现在常说的易经，实际上是《周易》。

我国古代有“三易”，即：连山、归藏、周易。

《连山》，为夏代易学，由艮卦开始，象征“山之出云，连绵不绝”。

《归藏》，为殷代易学，由坤卦开始，象征“万物莫不归藏”。

其中”。

《周易》，为周代易学，由乾卦开始，象征“天为大”；也有人认为《周易》由乾、坤二卦开始，象征“天地之间，天人之间”或表示“有天地，然后万物生焉”。

为什么夏代的“易”名为“连山”、殷代的“易”名为“归藏”、周代的“易”名为《周易》，且“三易”各有不同的首卦呢？这当然不是偶然。

我们知道，夏朝的建立者为大禹的儿子——启。启得以承继王位，建立夏朝，完全是借助于他的父亲禹。

禹，是靠治水起家的。

尧之时，洪水泛滥。禹的父亲鲧，奉尧之命去治水，一干就是九年。但鲧未能将水患治理好，结果获罪，被尧的继承人舜杀死。鲧被处死之后，鲧的儿子禹又被派去治水。子承父业，禹日夜操劳，费尽心血；传说中，有禹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的故事。禹改变了其父仅以“堙塞”治水的方针，来个堙塞与疏导并用，终于将水患治好。禹以治水有功而名传天下。

舜年老了。在部落联盟的会议上，舜提出了推选继承人的问题。大家不忘禹治水的功绩，纷纷推举禹为部落联盟的首领，于是禹的时代开始了。

禹年老时，部落联盟会议推举精明能干、铁面无私的法官皋陶为禹的继承人，但皋陶却死在了禹的前边。于是再次推举，众人以为舜时的旧臣（曾助舜治水，并做过焚荒、驱兽、驯兽的工作）后又为禹臣的伯益是合适的人选。然而伯益却未能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。禹死后，禹的儿子——启，借助其父的余威和势力，并施展阴谋，终于登上了“王座”，且由此建立了夏王朝。夏王朝的建立，意味着“传贤不传子”的禅让制被破坏。

夏代的“易”——《连山》，很可能不起始于夏，而是出现在尧、舜时代。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人们无处逃生，只能向高山上跑。在落荒逃命的先民们的眼睛里，世上能够解救他们于洪灾水患之中的，大约只有这山。于是人们感恩于大山，视“山”为伟大之物、为佑护之神。当巫师禳灾祈福时，便认定大山有超自然力，甚至认定“山”为第一神。由此，易卦的首位为“艮”（山）也是毫不奇怪的。鉴于此，那时的“易”便被称为《连山》了。“连山”，这好像是说，人的命运，与山相连相接。如果没有山，哪能逃出洪水的困扰和危害？有了山，人们才得以活命；只有活命，才可谈得上其他。这样，《连山》得以流传，从尧、舜时代到夏代。由于《连山》与大山挡洪水有关，由于夏朝君王的先祖禹是以治水而出名得天下，所以延用《连山》易被夏王室所接受，并被视为理所当然。天长日久，后人将《连山》视为夏易。

值得提一下的还有炎帝也称“连山氏”。《帝王世纪》中写道：“神农氏，姜姓也。母曰任姒，有蜥氏女，登为少典妃，游华阳，有神龙首，感生炎帝。人身牛首，长于姜水，有圣德，以火德王，故号炎帝。初都陈，又徙鲁。又曰魁隗氏，又曰连山氏，又曰列（烈）山氏。”或者，这《连山》并非出自尧、舜时代，而与炎帝有关？这也是可能的。如是，《连山》便源于更加久远的年代。它或者是炎帝族发明或使用过的“易”，或者是连山氏族发明或使用过的“易”。关于这一点，史书上没有记载，我们只能是依据名、目的巧合而推断罢了。

到了殷商时代，情况有所不同了。洪水早已消退，人们对于洪水侵害的记忆已经淡漠，有的甚至全然不知；也许老人还会提到它，但老人也是听上一代老人述说的。因此，人们对于

“易”卦从艮（山）开始，并称之为《连山》，开始感到莫名其妙。此外，商王室出于政治的考虑，感到应该改变《连山》。既然“易”是决定军国大事的依据，那么使用业已被推翻了的夏朝的《连山》易，似乎不大合适，因为它不利于其政权的巩固，也不利于消除前朝的影响。于是殷商决定改变易名，也要改变“易”的结构，特别是对起首卦。这的确是需要费一番心思。

传说中，商人的祖先为“契”。契的母亲叫简狄。简狄为有娥氏之女，曾与两位伙伴去河里洗澡，见到玄鸟（燕子）落蛋。简狄拾取玄鸟蛋而吞下去，就怀了身孕，然后生下一个儿子，即“契”。于是商人以玄鸟为其图腾标志。这也是母系氏族社会中“知其母，不知其父”的反映。

既然殷商的祖先出自母亲简狄（和玄鸟），那么他们的一切都是这个伟大的母亲给予的。于是，殷商将“夏易”的《连山》卦改为《归藏》。取义为——万物莫不归藏其中。即一切都来自母亲简狄。易名更换，起首卦自然也须更换。既然万物都来自母亲，那么天下的初始自然与母亲有关。于是，坤（母）卦凌居首位。

改变《归藏》的易名和格局的，很可能是《周易》卦辞和爻辞的作者西伯（即周文王）姬昌。

在上古五帝中，黄帝、颛顼、帝喾都是姬姓。西伯姬昌，大约是黄帝的后裔。《史记》中说：“西伯囚羑里，演周易。”西伯，即殷商西部的周部落联盟的首领姬昌。据传，后稷为周族的先祖。后稷，名弃，其母姜嫄为帝喾正妃。姜嫄踏巨人足迹而怀孕，生下后稷。大约由于后稷是“私生子”，所以生下后便被其母弃于隘巷，故名“弃”。弃长大以后，教民种五谷，被称为：“后稷”，有“稷神”、“稷王”之意（稷，为黍或粟，古代以稷为百

谷之长，被奉祀为谷神）。稷的后人——周族，居住在郃（tái），即现在的陕西武功西。后稷的曾孙公刘，率周人由郃迁居于豳（bīn），即现今的陕西旬邑西。由于戎狄部族的威逼，古公亶父又率部众迁至岐山下周原（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）。商代，周为殷商的附庸诸侯国。“伯”为排行第一、老大，一方的首领也为“伯”。西伯，便是西周的首领的简称；此外，姬昌是周部落联盟的首领，自然“排行第一”，在周为“老大”。由于古代五爵——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是在周代分封的，所以殷商时代的“伯”，与周代的“伯”不尽相同。

西伯姬昌是商纣王的“臣子”。他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，曾被商纣王囚禁在羑（yǒu）里（今河南汤阴县城北四公里处）。姬昌之所以被囚，其说不一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说：纣王“以西伯昌、九侯、鄂侯为三公。九侯有好女，入之纣。九侯女熹淫，纣怒，杀之，而醢九侯。鄂侯分之强，辩之疾，并脯鄂侯。西伯昌闻之，窃叹。崇侯虎知之，以告纣，纣囚西伯羑里。”纣王所封的三公，即周族的西伯姬昌（姬昌也曾称“王”，死后又被谥为周文王）、鬼方部的鬼侯、鄂地（河南沁阳）的鄂侯。由此可见，当时的周族已具相当强的实力；否则，姬昌不会被封为王以下的一等爵——公。殷商与鬼方联姻，大约是为了笼络鬼方。但过后不久，九侯的女儿便以“熹淫”而被杀。纣王不仅将九侯的女儿杀死，而且将九侯剁成了肉酱。九侯之女，自然是在鬼方长大的，不能不受鬼方风俗的影响。鬼方，为我国古代西北部地区的部族，可能与羌族近缘。当时的鬼方，可能正处在对偶婚制时期，因此，鬼方人对男女性关系的混乱一定不甚以为然。但是，九侯女的“熹淫”（大约是与他人“私通”）却为自身非常荒淫的纣王所不容。不容倒也罢了，动辄杀人，还

迁怒其父，连朝廷重臣力争，相劝的鄂侯也被割成肉干儿，甚至连暗自叹息一声的都不放过，可见纣王的残暴和昏庸。不过，在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，太史公对西伯的被囚却有另一种说法：“西伯曰文王，遵后稷、公刘之业，则古公、公季之法，笃仁，敬老，慈少。礼下贤者，日中不暇食以待士，士以此多归之。伯夷、叔齐在孤竹，闻西伯善养老，盍往归之。太颠、闳夭、散宜生、鬻子、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。崇侯虎潜西伯于殷纣曰：‘西伯积善累德，诸侯皆向之，将不利于帝。’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。”这是说，由于姬昌遵能干的先祖之业，礼贤下士，积德行善，致使人心归向。有人将此告密，纣王担心姬昌的势力壮大将危害自身的统治，于是纣便将姬昌囚禁起来。前后说法不一，但告密者都是崇侯虎，同时也都表现了纣王的昏庸残暴。

姬昌被囚禁以后，狱中详情难以知晓，但太史公在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说：“西伯盖即位五十年。其囚羑里，盖益《易》之八卦为六十四卦。”又有人说，西伯被囚禁时，不仅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，而且为六十四卦作了卦辞和爻辞。

可以想象，初入狱时，姬昌惊惧万分。当他的属下打通关节，与他见了面或暗通了口信以后，他才稍有所安。他一定对属下暗下了指令：不惜重金到纣王身边去活动、行贿。他是深知纣王贪财好色的。属下去后，他便在狱中等候消息。一天一天地过去了（据说姬昌被囚禁达七年之久），失去自由的姬昌感到烦闷无聊，但又无事可做。这时候他想到了《归藏》，想为自身的安危占卜一下凶吉。占到凶，他灰心丧气；占到吉，他喜出望外。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，凶也罢、吉也罢，他只能在囚禁中度日、煎熬。忽然他想起了这《归藏》是殷易。想到殷易，便想到了荒淫无道的殷商纣王——怒气冲上来了。为什么

要相信它呢？这个靠不住的《归藏》，这个该死的纣王！愤怒之余，他决心推翻纣王的统治。要推翻纣王的统治，首先该推翻殷商的“运道”。他想，干脆不听《归藏》的凶语吉言，重起炉灶。他以为，“天道”不正，君王不明，天下的百姓（主要指王以下的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等）就会遭受苦难。所以他认为“天道”是至关重要的。于是他將乾（天）卦放在首位。这不仅仅表明他要施展胸中大志、“替天行道”，同时表明他对殷商提出了挑战。但他并不胸怀狭隘地因《归藏》的首卦为坤（地），便否定“大地母亲”；他知道“大地母亲”养育了万物生灵，知道她的伟大。于是，他将坤卦放在第二位。

太史公说西伯“盖益《易》之八卦为六十四卦”，是不大可靠的。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六十四卦的卦名便可发现，如果说上经三十卦的卦名隐含着“人生权谋”或“帝王术”的话，那么下经三十四卦则是记述了一个男人的生活经历——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。这个男人，是生活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，即对偶婚出现以后的一个“典型”的男人。由此可以证明，六十四卦的卦名不是姬昌所为，六十四卦的卦象也不是姬昌从八卦演化而来。他可能是为六十四卦重新排列了次序，后人却误以为发展了八卦。

但姬昌并不满足于六十四卦的六十四种符号和六十四种卦名，他决定为它们作注释、作解说。在几尺方圆的地方，他踱步默想，他倒床暗思，不仅为六十四卦作了卦辞，而且为每一卦的六个爻作了爻辞。如果说“卦辞”是每一卦（每一种情况）的总述的话，那么“爻辞”便是每一卦（每一种情况）的具体变化（每种情况中的多种情态）。总述加上六种情态的分述，便是卦辞和六个爻辞。六十四卦，计有六十四条卦辞和三百八

十四条爻辞，总计四百四十八条。由于姬昌认为乾、坤二卦在整个“易”的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且是“天道”、“人伦”的根本，所以他又在乾卦六爻的后边加上一个“用九”（即综合起来看乾卦的六个阳爻），在坤卦六爻的后面加上一个“用六”（即综合起来看坤卦的六个阴爻）。这样，他这格言、语录式的卦辞和爻辞，便成为四百五十条。

姬昌毕竟是一方的诸侯，所以狱卒并不敢为难他。或许狱卒被姬昌的为人品格所感化了，或许姬昌的家人、部下用钱财打点了狱吏、狱卒；或许狱吏、狱卒想到了纣王有可能会赦免姬昌，便卖了个“人情”。总之，姬昌在狱中的待遇还算过得去，并没有受到什么非人的虐待。他可以不大受干扰地沉思默想，或许他可以通过狱卒获取写字用的涂粉和羊皮，他得以将他的所思所想记录在羊皮上。

可以设想，姬昌原本并不想创造一种新的“易”，只是借此来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、个人感叹、内心的愤怒和仇恨，并且分析总结为人处事之道和施政方略。他想着，有朝一日，他要奋发图强，最终推翻商朝。不仅仅因为商纣王荒淫无道，不仅仅不愿意永远受制于人，而且他与殷商有杀祖之仇。殷商两大族，很早就发生交往。商代夏而君临天下以后，周族成为殷商的附庸。周之所以依靠殷商，一方面是由于殷商的强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周族受到戎狄部族的威逼。纣王的祖父文丁（太丁）当政时，周族的首领、姬昌的父亲季历曾被“命为殷牧师”（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注引《竹书纪年》）；但后来，季历又被文丁杀死（《晋书·束皙传》注引《竹书纪年》）。如今，姬昌被囚禁在殷商的狱中，他必须谨防纣王的耳目。于是他想到了利用“易”。当时的殷人，非常迷信龟卜，同时也笃信占筮。

姬昌的父亲季历精通龟卜和占筮，姬昌深受其影响。所以，姬昌对《归藏》甚至《连山》都很熟悉，是可信的。不过，姬昌想推翻殷商的统治，也就想从根本上改变殷商的“运道”；由此，他便不想沿用殷商所迷信的易——《归藏》。不仅仅出于憎恨，而且是认识理念的差异和叛逆。他对坤卦当首不以为然，因为他不能忍受殷商的“包办天下”。他认为，天下太平，至关重要的是遵“天道”，讲“天理”。所以他将乾（天）卦列在首位，而将坤（地）排在乾卦之后。但仅仅这样，还不能将他的政治抱负表达出来。当时的《归藏》，虽有六十四种变化的卦，但并没有统一的卦辞和爻辞。大约只有口头的卦辞——是巫师依个人的领悟和灵感信口而说的；或者只有口头流传的卦辞（解说词），由这巫传那巫延续下来。这样流传下来的卦辞和占语，不会是固定的、统一的。灵机一动，姬昌决定将他所欲表达的东西寓寄在卦辞和爻辞上。当然不是一般的、生硬性的寓寄，而是依据六十四卦的卦象和卦名来巧妙地结合。多少个日日夜夜，他写着——如何立志，如何心怀天下，如何为人处事，如何交友，如何创业，如何走出逆境，如何治理国事，如何居安思危，如何对待婚姻、家事……时而借喻，时而象征，时而直发感叹，时而暗指影射。他将人生哲理、世间情态，尽收其中。终于，一部披着“易学”外衣的著述问世了。

就在姬昌著述这假“易学”的时候，他的属下散宜生、闳夭、太颠等，正在四下活动。他们将有莘氏之女、骊戎的文马等献给了纣王。贪财好色、昏庸残暴的纣王哪知“放虎归山”的危险，姬昌终于化险为夷了。

姬昌在狱中所写的著述之所以没引起纣王的注意，一个是它披着占筮的外衣；此外，当时的文字教育仅流行于王公贵族、

诸侯、士大夫阶层，一般人大多处于“文盲”的状况。狱卒、狱吏之流，大概是目不识丁的；他们只知道姬昌在写有关占筮的书，具体什么内容他们不知道，即使知道也看不懂。所以，他们会认为没必要向上峰反映。或许反映了，上峰不以为然。

姬昌回到周原以后，励精图治，并按照他在狱中所思所想总结的谋略行事，使国势更加强盛起来（姬昌号称西伯，实际上他已被商纣王封为“公”——这是王以下的一等爵位）。姬昌前后在位五十年，临终前传位给长子姬发（周武王）。在传位之前，他也必定曾将其狱中所思所写的谋略与两个儿子——姬发、周公旦商讨过；或许在临终前，他将那本被后人称为《周易》的书传给了姬发和周公旦。姬发和周公旦肯定对此书进行过研究，甚至进行了补充和修改。西伯死后的第四年春，姬发乘商军主力在东南与越人作战的机会，率兵车三百乘、虎贲三千人，联合庸、蜀、鬃、微、卢、彭、濮等方国部落，向东伐纣。在殷商都城附近的牧野（今河南淇县），纣王以用囚犯匆匆组成的军队与西周及其联军决战。结果，商军阵前倒戈，姬发率领西周及其联军乘胜灭商，建立了西周王朝。姬发，便是著名的周武王，其父姬昌被谥为“周文王”。姬发继承父业，并依父亲的著述行事而得天下；其父的著述，便是披着“易学”外衣的《周易》。

不过《周易》名传天下，功在孔子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说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。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。”为此，孔子感慨万分地说：“假我数年，若是，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。”这就是说，孔子在年轻时代和中年时代没有读过《易》，或者连听说过都没有；或者听说过，他误认为《易》是一部有关占筮的书，所以不甚重视，便没有去读

它。直到晚年，孔子才翻阅《易》。这一翻阅，可不要紧，他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占筮的书，而是阐述人生哲理的一部妙书，而且文笔简约、优美，内涵丰富、隽永。致使他反复诵读，连编联竹简的熟牛皮绳子都被他弄断了三次。孔子一边读《易》，一边感叹：“我怎么早没读这部书啊！”感叹之余，孔子为《易》书写了评论、注释等。可见姬昌的《易》在当时就是比较难懂的。对《易》的评论和注释，是孔子继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订《礼》、《乐》、作《春秋》之后的晚年之作。甚至有可能，孔子也对《周易》进行了增删和改写。在孔子的推崇下，《易》被儒家定为五经（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）之首。

春秋时代的孔子，会受时代局限，不会完全摒弃“占筮”而不受其影响。但他毕竟是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、大学者，与巫祝等不可同日而语。因此，如果《周易》仅仅是一部关于占筮的书，便不会使孔子弄得“韦编三绝”。孔子是深领其妙的。

秦灭六国以后，统一了天下；因有人向秦始皇进谏，请求效法殷、周，搞分封制，而引发了焚书坑儒。实行焚书坑儒，是丞相李斯建议的。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中记述了李斯的上书：“古者天下散乱，莫能相一，是以诸侯并作，语皆道古以害今……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。闻令下，即各以其私学议之，入则心非，出则巷议……臣请诸有文学《诗》、《书》百家语者，蠲除去之。令到满三十日弗不，黥为城旦。所不去者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……”秦始皇赞同李斯的建议，下令“收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之语，以愚百姓，使天下无以古非今。”就这样，姬昌的《周易》（《周易》连同孔子的注释等被称为《易经》），被列在“卜筮”之列，而免于被焚之灾。

但是，这里也有一个很大的疑问，即李斯不能不知道《易

经》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，如何会放过它呢？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中说：“李斯者，楚上蔡人也。年少时，为群小吏……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……”李斯是跟随荀子学“帝王术”的，怎会不读论述了“帝王术”的《周易》呢？或许，正是由于李斯对《易经》深有研究并由此深受启示，才使李斯登上丞相的“宝座”吧；所以，他偏爱此书，便悄悄地将《周易》归入“医药卜筮种树之书”之列。一个“易”字，使它于大难之中蒙混过关。

《易经》免于被焚，便成为“官家”批准下来的可以公开“刊行”、“习读”的书了。于是，有志之士以“卜筮”的名义来读它、研究它、运用它；而卜官巫师则“名正言顺”地将它奉为占筮用书。毫不奇怪，因为《周易》包罗万象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婚姻、家庭、争讼、交友、进仕、退隐、待人处事，论及道德、品格、修养、行为举止……而人们所欲占求的内容，无非就是这人世人生种种。人们是可以从《周易》中各取所需、各取所求的。于是卜官巫师们将蓍草、竹签、掷钱和《周易》联系起来。天长日久，《周易》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便成为一部地地道道的占筮书了。但是，它是被后人误解了的、歪曲了的、神秘化了的和惟我所用了的。

我们说《周易》博大精深，并不为过。特别是它产生在三千年前。它不仅对儒、道、佛发生影响，而且对我国古代的天文学、医药学等，也发生了极大的影响。同时，它的某些辞句，还被融会在汉语语汇中。例如：否极泰来、谦谦君子、虎视眈眈、突如其来、枯杨生梯、不速之客、羝羊触藩、匪夷所思、密云不雨等，大多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。《周易》是完全可以与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·培根的著名哲理著作相媲美的。

但是，我们依旧应该指出，《周易》问世至今，已逾三千年。无论它的作者姬昌多么高明、博学，他的思想、观念都不可能与现代人完全吻合。他的著作中有不少精辟的警言警句，虽然依旧具有“生命力”，但也有许多论断和分析，已属“过时”，已不适用于今天。

此外，生活在三千年前的姬昌，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、社会生活、社会意识及风俗习惯的影响和制约。我们知道，殷人非常迷信龟卜，且信鬼，几乎是天天卜、事事卦，并且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。作为殷商的臣属，姬昌也肯定不会完全免俗。因此，当姬昌在狱中抒发政治抱负时，也时常流露出“天命”的意识。对此，我们是应该加以分析和摒弃的。

为了深入地探讨《周易》，我们将重点介绍《周易》卦辞和爻辞的内容，而不取《周易》之外的出自他人之手的“彖”、“象”等解释、注释和引申。笔者认为，与《周易》卦象关联密切并带有神秘色彩的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及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八卦等，都与古代人的社会生活及社会意识紧密相关。甚至可以说，它们大多为古人用来记事的规定符号，即文字的前身。因此，它们原来并不神秘。只不过，由于年代久远，或者由于人为地演绎、发挥，这些符号越来越陌生了。

我们对《周易》卦辞和爻辞的解释，不完全沿袭旧时流行的说法。首先，笔者认为，《周易》每一卦的卦辞，是本卦（本章节）的提纲挈领，也可以说是概括式的论述；而每卦中的六个爻的爻辞，则是这个方面的六种情况，或说是提纲挈领之下的六种变化。同时，对于卦辞和爻辞，也采用在不失其本意情况下的“直译”和“义译”相结合的办法，力求通俗易懂。如遇象征和比喻，则取其内含的意思。对于“占筮”语言，我们

也力求将其化解为现代语言；或者说，力求将“占筮”用语的象征意义表现出来。笔者认为，只有这样，才可真正体现《周易》作者的本意。正如前面所述，姬昌在狱中作“卦辞”和“爻辞”，原本是要掩人耳目的，不得不夹杂一些“占筮用语”。现在则没必要“掩人耳目”，而应该将姬昌本来想说的话铺陈开来。

最后，我们回过头来说关于“易”的三种解释。

综上所述，易的“飞鸟说”和“蜥蜴说”，似乎更近于古人对“易”的理解。笔者认为，“蜥蜴说”与《连山》联系密切。尧、舜时，从洪水中逃亡出来的人们，登上了山岗。在登山过程中和在山坡休息的时候，人们看见了在岩石上爬来爬去的蜥蜴。从蜥蜴可变的保护色上，人们（特别是巫师）很容易得到某种启示或引发某些联想。也许正是这蜥蜴，引发了某位巫师关于《易学》的初步构想。而“飞鸟说”，是更容易使人于《归藏》相联系。因为《归藏》是殷易，殷人的图腾是玄鸟（燕子），也便是“飞鸟”。至于日、月合成的“阴阳说”，大约是后人的附会，或者系后人的一种解释。因为在商末周初，阴阳对立的观念还没有确立。太极中的“阴阳鱼”，或者是后人在阴阳观念的影响之下所绘制的，或者原始的“阴阳鱼”（不一定与后来的“阴阳鱼”完全一样）只是白昼与夜晚的符号性表现，而不是后来意义上的阴阳观念的体现。

由“蜥蜴”和“飞鸟”，人们想到了“易”，并且悟出了“易”的三个“境界”，即：变易、简易、不易。蜥蜴的变色，是变易；飞鸟的飞翔，也是变易。这种变色和飞翔，对于蜥蜴和飞鸟来说，是简易的。忽然，人又悟出了其间的神妙：这实在是“不易”的啊！《易》出现以后，人们又引申这三“易”为